



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

主编：曾志刚 执行主编：周建新

宋元时期汀州区域开发与 客家民系形成

靳阳春◎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

主编：曾志刚 执行主编：周建新

宋元时期汀州区域开发与客家民系形成

靳阳春◎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元时期汀州区域开发与客家民系形成/靳阳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5250 - 8

I. ①宋… II. ①靳…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长汀县—宋元时期
②客家人—民族历史—研究—长汀县—宋元时期 IV. ①K295.74 ②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749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李舒亚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7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福建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宋元汀州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2012B059）最终研究成果、

江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ZD132）

资助阶段性成果

总 序

客家人是汉民族的重要支系，主要居住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区域，分布遍及全球各地，是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族群之一。客家人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长期的迁徙和发展中，客家人吸纳了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养分，汇成了蔚为大观、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在方言、饮食、建筑、风俗、岁时节庆、民间信仰等方面特色鲜明、内涵丰富。自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开创客家学以来，客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客家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借鉴了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逐步发展成为一门以“客家”为研究对象，以“客家”的历史、现状、未来及客家语言、族群认同等为主要内容，并揭示“客家”的形成、演变的综合性学科。

客家文化是汉民族中一个系统分明的地域文化，具有我国地域文化普遍特征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又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族群文化，客家人对自身文化与族群有着高度的自觉与认同感，以对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及其突出的族群凝聚力和向心性而著称。客家社会处于汉族边陲地带，他们的特殊性展现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与少数民族维持密切的互动，但在族群意识上又坚称自我为汉族血统之精粹。所谓的客家文化即在这两种不同张力的互相拉锯中形成。因此，客家社会文化研究，不能停留在汉文化或客家文化的种族中心论视野，必须从族群互动的角度，探讨客家社会在不同区域的族群关系与历史文化发展过程。

自清代以来，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区的客家人在与土著的摩擦和接触中渐渐发展出显著的族群意识，他们宣称，自己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后裔，保持了纯正的汉人文化与传统，以此区别于周边族群。客家的族群认同也随着客家人迁居海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而四处播散，成为全球性的族群认

同。在我国众多族群中,这种强烈的族群文化传播与认同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因此,对客家族群与文化的研究应更多地注重其自身的认同,并尽量从客家人自己的言说来理解客家族群的历史,从认同的角度切入,将客家族群视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客家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以客家文化为纽带,以客家学术研究为媒介,可以充分发挥客家人在海内外交流“文化使者”的作用,对客家族群与认同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阐释作为文化传统具有延续性的中华民族认同的一个典型案例。关于客家文化与认同、客家族群意识的探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华裔澳大利亚学者梁肇庭。梁肇庭先生结合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与人类学族群理论,对客家史研究进行全新的理解。客家人在宣扬族群认同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其中国性,保持着明确的国家认同,表现尤其明显的是后来迁居于海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客家人,他们的寻根意识及各种社团皆以爱国为宗旨,形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统一。比如,在中国台湾,客家人有450万人之多,他们对中国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客家历史文化研究,可以充分体现海峡两岸客家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

自人类起源,就开始了迁移,伴随着迁移,人类开始分化并构成不同的人群和社会。即便在安土重迁的中国文化中,任意打开一本族谱,迁移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因此,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移民性族群,对客家的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理解,深化我们对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识。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所说:“客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缩影、典型、样板,或曰范式,是中国人民献给人类的一份厚礼。保护、弘扬和创新客家文化,是客家之所急需,中国之所急需,世界之所急需。”因此,深入研究客家文化,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这里回顾过往的客家研究,不仅是为了理清客家学之历史脉络,更是为了表达一个期望,即希望客家学研究可一路向前,而“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正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该丛书由江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江西省首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策划,旨在推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客家研究著作,选取当前客家学界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

果,力图呈现研究论著视野的新颖性、理论的前沿性与文献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提升客家研究的理论水平,扩大客家学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

丛书的编者和作者相信,现阶段的客家研究不应该是宏大叙事风格下的、面面俱到的研究取向,而应该是通过具体事项、具体区域或具体个案的具体研究以表达出对客家问题的整体了解。因此,丛书的作者突破了过往研究试图通过某单一学科,如历史学或人类学,研究客家问题并将其置于学科分类体系之下的构想,而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取向,而努力将各个学科的前沿理论与方法应用其中。文献分析法与田野调查方法、文字史料与口述史、共时性分析与历时性分析、社会结构范式与社会行动范式等在其中得到了应用,并有了极佳的切合点。虽然每一本书的研究问题、研究对象都可以说是相对独立的个案,但每一个个案却与客家研究整体把握相联系,立足于客家研究的整体关怀中。换句话说,每一位作者都是以具体区域、具体事项或具体个案的研究分析以回应宏大的客家问题,这个问题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是普遍学科意义上的。

这一套丛书最大的意义在于:

第一,视野的新颖性,即由关注客家问题的“共同性”向“地方性”转变,同时将“结构”与“变迁”两个概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关注到了地域文化、地方崇拜、社会经济变迁及族群问题等的动态过程。同时,丛书的作者已经认识到,客家研究不仅要阐述客家历史的客观性,而且要关注客家人在构建“客家”过程中的能动性,甚至要反思客家研究本身是如何在“客家”构建过程中被结构化及这种结构如何影响客家人的行动。

第二,理论的前沿性,即将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符号学、现象学及考古学等引入研究中;西方人类学领域的象征人类学理论应用于阐释如服饰、饮食、民居、音乐、艺术及信仰等具体的客家文化事项,族群理论应用于解释客家族群意识、形成、互动等问题;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区域研究理论应用于地方社会变迁及构建等问题。与此同时,丛书作者采用了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贯穿在研究过程之中。“深描”、“族群边界”、“结构过程”等前沿理论概念在丛书作品中也被不同程度地使用。

第三,文献资料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即突破以往研究只注重文字资料

的使用,而开始采用口述史资料。丛书的作者没有枯坐在书斋里,而是开始接触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调查,把“获得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丛书作者结合使用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的方法,到具体的地域,采访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收集地方文献与民间文书。由此,正式史料、民间文献与口述传说、民间表述等综合应用到客家研究的“全息信息”采集分析过程之中。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客家研究由肇始阶段走向学科建设和蓬勃发展之时,研究成果已在梳理史料、论证源流、文化考究等方面颇有建树。然而,诸前辈研究之视野始终未有突破,学科界限依然清晰可见,且分散性的研究止于就事论事而未能形成理论体系。直至今日,客家研究仍未能对客家问题形成整体性、系统性的学术关怀。近年来,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中青年客家学者引入多个学科的前沿视角,收集多个领域的翔实材料,形成了一批深入讨论客家问题的成果与论著。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顺势而为,选取其中一些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连贯的精品著作,组织出版“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构建一个相对系统的客家研究丛书库,力图对客家问题形成整体性关怀。

此次出版的“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为第一辑,由曾志刚教授任主编,周建新教授任执行主编,本辑共有8部著作,其研究对象与时空范围涉及唐宋以来客家文化的多个面向。唐宋以来儒家文化开始在赣闽粤边区传播,邹春生博士著的《文化传播与族群整合——宋明时期赣闽粤边区的儒学实践与客家族群的形成》指出,儒家文化在赣闽粤边区的传播促使当地多元族群产生“文化认同”,从而形成“客家”共同体。宋元时期,汀州社会经济历经巨大变迁,靳阳春博士著的《宋元时期汀州区域开发与客家民系形成》提出,宋代闽西山区交通的发展促进汀州经济发展,而元初以来的畲汉联合抗元斗争促进族群融合又壮大了在南宋形成的客家民系。明中期以来,赣闽粤边界地区普遍经历“正统化”过程开始,黄志繁博士等合著的《明清赣闽粤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晚清客家族群认同建构的历史背景》一书以赣南营前镇、粤东百侯镇为个案力证在晚清“客家文化”被建构成“中原正统文化”的历程中,“正统化”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黄韧博士著的《神境中的过客:从曹主信仰象征的变迁看岭南客家文化的形成与传承》一书独辟蹊径,结合民间信仰、早期移民、族群互动与区域经济等方面,采用历史人类

学、结构人类学和解释人类学等研究范式，并纳入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及区域研究的理论视角，深入研究了广东北部曹主信仰。在人类学整体性视阈中深入阐释了粤北地区宗教信仰的文化变迁与地方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指出北江流域的商业活动带动曹主娘娘信仰的传播，同时神话系统内又整合了不同群体的流动、互动、融合及冲突的记忆。该著作以全球化视角与中国人在国外的在地化经验研究重新审视客家问题，可谓是客家学研究又一新的视野。

历史上，随着大批中原族群南迁至赣闽粤边区，当地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家统治及儒家文化亦纷至沓来，使得赣闽粤边区由“化外之地”转为“化内之地”，客家文化认同遂于此发轫。同时，交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闽粤赣地区各个族群间互动与融合，文教的发展促进了客家文化形成。最终，客家人的自我认同在波澜壮阔的冲突与斗争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发展壮大。其中，“客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生态变迁和族群关系中借由赣闽粤边界地区普遍经历的“正统化”过程所建构的。然而，“客家”并非是一个恒定不变的范畴，其往往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且客家族群的世界性流动经验往往不折不扣地在超自然象征系统中呈现。总之，客家族群的形成既是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也是“他者”所建构认知的过程。故此，上述四部著作是将“客家”置于族群认同与族群互动中，结合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全方位地考察了客家族群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外因素。

同时，“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第一辑著作涵盖了对多种客家民俗文化事象的深入探讨。该丛书第一辑由曾志刚教授任主编、周建新教授任执行主编。周建新教授与张海华副教授将客家服饰置于客家文化历史脉络之中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跨学科研究，其著《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完成了对客家服饰的视觉识别、行为识别及理念识别过程，并指出其属于“器物文化”、“活动文化”及“精神文化”的范畴，所呈现的是客家文化与精神特质。肖文礼博士对赣南地区礼俗仪式中的艺术行为和音乐活动进行分析，她在《岁时节日体系中的赣南客家仪式音乐研究》一书中提出，客家文化在岁时节日体系中是具化的事项，即具体的时空下借由祭祖、庙会、独有仪式及国家展演所呈现的族群情感与族群关系等。王维娜博士在具体的语境中考究了福建长汀客家山歌，写成《传承与口头创作：地方知识体系中的客家山歌研究》，认为长汀客家山歌未因演唱空

间改变而消失,根本在于其地方性知识体系的传承,同时地方性知识中还蕴含着歌手演唱和创作的根源。温春香博士关注宋元以来赣闽粤毗邻区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表述问题,其著《文化表述与族群认同——新文化史视野下的赣闽粤毗邻区族群研究》指出,明代闽粤赣毗邻区的大规模动乱及明中后期以来的社会重组导致文化表述的转变,即借用一套文化的逻辑和汉人的意识以达成历史书写,并与历史进程并驾齐驱促成族群身份认同。

服饰乃个体与群体进行自我身份标识的最直接手段之一,客家服饰在视觉、行为及理念上的差异,蕴含其中的往往是族群性的范畴,即客家族群所持的独特属性。而音乐作为沟通人与天地的神圣手段,仪式上音乐所呈现的是客家人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及族群认同的观念,形成了一套客家人所共享的独特精神文化。同样,声音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与传承文化的载体,客家山歌体现了客家人的价值观、爱情观、历史观和社会观念,传承客家山歌的背后是对客家文化及其精神特质的传承。最后,客家族群区别于其他任何族群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由历史及文本的书写所表述的,而现阶段所呈现的任何一种文化特质都是一种由文化表述所构建的文本。总的来说,上述四部著作将学科关怀转向民俗学,通过考察非常具体且物化的民俗,呈现出具体的民俗作为文本的表象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展示了客家族群的“异”与“同”。

诚然,“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的每一著作都归属于“客家研究”这一大命题,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辈的研究成果,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阔步前行,深入把握客家之意涵,拓宽研究客家之视野,明确探索客家之方法。客家人是一个既重视传承又注重创新的族群,坚守着其独有的族群文化特质,开放地流向于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并吸收“他者”优异的文化特质而具有极强的生存力。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推进,传统的客家文化与客家精神也在全球范围内生根发芽。因此,“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的出版必然对整体把握客家、了解客家,甚至对重新理解客家、建构客家都有着深奥而久远的意义。同时,该丛书力图建立一门独立的客家学学科,并超越地方性研究的范畴,而将其推向单一族群全球性流动研究的领域。我也衷心祝愿客家研究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

中国正处在急剧的变迁之中,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成为重要的学术命题,笔者提出,中国从地域性社会向移民社会的转型就是其一。这就是随

着人群流动的频繁，城市化的加速，那种单一人群构成的地域社会不复存在，而更多地表现为多人群多族群共生构成的移民社会。作为地域性特征明显的客家族群也正在经历着这一变迁，而这种经历、变化也对客家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是为序。



2015 年春于康乐园

(周大鸣：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序

客家史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的 20 多年是一个迅速发展时期，也是个丰收的时期。学者们大体围绕着移民史、民族融合史与区域开发三个向度，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厘清了不少问题。但存在的问题或曰尚待开掘的问题仍然不少。其中，从时间的角度说，唐五代以前及明清以后的论述较多，宋元这一段比较薄弱；从空间的角度说，泛论赣闽粤交界区域即所谓客家大本营地区的论述较多，对这一大本营地区分区域的论述比较薄弱。所以，若要深化客家史的研究，则抓住宋元时期，分别从赣闽粤之交的小区域即赣南、闽西、粤东做深入的探讨，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记得早在 20 年前，我就发现了客家史中宋元这一段尤其是元代一段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加强这一段历史研究的倡议。1995 年，有位刚从大学毕业分到我在的福建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工作的同仁，想跟着我学习和研究客家史，我就安排她细读元史及元代文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没有进行下去。后来，我自己倒是读了元史中与客家及畬族相关的部分，也读了一些宋元人文集，并据以做了宋末至元代畬客联合斗争壮大客家的种种论述，但是，也因为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这种“读”还远未达到“细”的地步，至今不能无憾。

靳君阳春 2006 年考入福建师大，师从我攻读博士学位，选择的研究方向是客家史。考虑到他是外省人，原先并没有受到客家研究的训练，也没有诸如懂得客家话、熟悉客家地理环境和文化风习等有利条件，而他的工作单位是三明学院，三明的好几个县份早先是宋元汀州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就建议他以宋元汀州为研究范围，从文献研读入手，结合必要的实地调查，开展他的研究。这样的设计，实际上是想把我原先的研究思路付诸实践。不巧的是，阳春君就读不久，身体就出了状况，在家休养几达两年，此后虽然完成了博士论文，多少是打了折扣了，并没有完全达

到我预期的目的。

通读阳春君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们感到做得最好的部分，是关于唐宋元汀州交通变迁的研究。他认为，属于闽江水系的九龙溪航道在唐代就已经开发利用，在唐宋时期其重要性要高于汀江。南宋绍定以前，汀江处于自然开发状态。南宋后期，汀江航道得到改善，为元代隆兴至潮州驿道的开通奠定基础。元代隆兴至潮州驿道的开通使汀州成为赣闽粤边区的重镇和交通枢纽，促进了以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这些认识，信而有征，是经得起检验的，而却往往为论者所忽略，因而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另外，阳春对于宋元汀州矿冶业和食盐走私的研究也有新见。他认为汀州矿冶业以北宋为盛，是当时的支柱产业，至南宋则渐趋没落，至元代则处于停摆状态。这一论断大体接近客观实情。他又认为，南宋时期，私盐贩卖成为汀州大部分人赖以谋生的重要产业，是后代汀赣间进行钱粮贸易的滥觞。以汀州为中心的私盐贩卖参与者成分复杂，而且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一直延续到元代。这一论断，也颇有参考价值。但论文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关于宋代汀州对外交通线路的评估，阳春认为，因为政治的原因，宋代汀州对外交通依然以与闽北的交通为主。这一点，可能还需斟酌。官方的交通，因为官员、文书和科考生员来往，赋税缴纳和军事征调等原因，即阳春所谓政治的原因，诚然是与闽北、闽中的交通为频繁，为重要，但民间的往来，却可能因为私盐盗运和畚客联合斗争、民众婚姻往来、集市贸易等原因，汀州与赣南、粤东的往来为多。南宋绍定以后汀江航道畅通，成为联系闽西粤东的大动脉，汀州与潮州（当时潮州涵盖整个粤东地区）的交通尤为密切和重要。若非这样，赣闽粤边区又何由联系紧密，从而逐渐酝酿形成一个客家民系呢？

总而言之，阳春君的这篇论文，选题是很好的，抓住了客家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作者也尽力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些新见富有参考意义。但存在的问题及想做而未做的工作尚多。希望阳春继续努力，争取拿出足以传世的好成果出来。尤其在宋元文献的挖掘整理方面，希望阳春及其他有志于客家研究的年轻学者，静下心来，扎扎实实下一番功夫，整理出一部内容丰富的宋元客家史料汇编，为客家研究的新突破做出贡献。

甲午菊月

谢重光序于榕城兰韵斋

中文摘要

文章从民族史、经济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发展史、历史地理学等角度，探究宋元时期汀州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轨迹，以及汀州客家形成核心地位的演变过程。

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原与福建的交通路线对历代南迁入闽移民活动的基本方向与走势产生了直接影响，南迁入闽的北方汉人从闽北进入福建。闽西始终处于国家权力扩展的边缘。直到唐宋以降，闽西山区才逐步得到开发，五代末期至北宋初年是汀州第一次接受大批北方移民的时期，两宋之际是汀州第二次接受大批北方移民的时期。

交通也随之发展。九龙溪航道在唐代就已经开发利用，在唐宋时期其重要性高于汀江。南宋绍定以前，汀江处于自然开发状态。南宋后期，汀江航道得到改善，为元代隆兴至潮州驿道的开通奠定基础。元代隆兴至潮州驿道的开通，使汀州成为闽粤赣边区的重镇和交通枢纽，促进了以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

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宋代汀州经济发展。北宋时期，矿冶业是汀州的支柱产业，南宋时处于没落阶段，元代则处于停摆状态。南宋时期，私盐贩卖成为汀州经济生活中大部分人赖以谋生的重要产业，是后代汀赣间进行钱粮贸易的滥觞。宋代汀州的集市层次非常完整，大部分集中在北部，表明宋代汀州的对外交通依然以闽北为主。

宋元时期汀州文教有了较大发展。汀州的教育机构完备，理学有所发展，并以汀州为中心形成了定光佛信仰圈。文教的发展促进了汀州社会风气的变化。

宋元时期汀州的社会矛盾激烈。北宋时期，汀州社会冲突危害轻微。南宋汀州动乱由百姓与政府争利的经济冲突，演变为以推翻地方政府为目的的叛乱行为。宋末元初，汀州抗击元军的军队多为购募，中后期义军以“复宋”为口号，动乱已经演变为带有强烈民族反抗意识的斗争。

客家民系在南宋初步形成后，经历了宋末元初直至元朝末期的长期畬汉联合抗元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畬汉族群互相融合，主流是畬民汉化，壮大了客家民系。客家民系迎来了第一次大发展高潮。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trajectory of Tingzhou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exploring the process to form the hakka core of the Tingzhou, mainly from the angle of National History,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History of immigration,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so on.

The route from Fujian to Central China directly impacted on the basic direction and trend of northern migration to Fujian sinc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st Fujian has been marginalized in the national power. Until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s society and traffic wer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waterway of Jiulong River had been opened in Tang Dynasty. It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ing river then. The waterway of Ting river did not open before Shaoding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developed in the lat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opening of Chaozhou post road to Longxing in Yuan Dynasty. This post road made Tingzhou as a traffic center in Jiangxi and Fujian border.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ngzhou in Song Dynasty. Mining industry was a pillar industry of Tingzhou in Song Dynasty.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in the decline stage. In Yuan Dynasty, It almost stopped. Most people made a living with smuggling salt in Tingzhou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s a result, the trade between money and grain developed and the social conflicts because of smuggling salt never stopped until Yuan Dynasty. During this period, various ethnic groups who lived here gradually formed a new group.

The education had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ingzhou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t had a good education system. Neo Confucianism had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too. And it formed a culture circle of the Faith in Dipamkara.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hanged the social customs. It formed Unique and outstanding of the Hakka people.

Tingzhou was not a peaceful place in history. There were too many social conflicts. These social conflicts caused minor damage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But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y became a threat to local governments. To Yuan Dynasty, the unrest of Tingzhou has turned into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resistance struggle.

The Hakka was initial formatio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y fight against the Yuan Dynasty with The She nationality for long time until the demise of the Yuan Dynasty. In the process, The She nationality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formed merge with each other. This promoted the growing of the Hakka people. The Hakka people came the first development climax.